

兩岸兩會 披露汪辜會談秘辛

元老

20年前的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兩岸兩會領導人（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首次「汪辜會談」，是1949年以來兩岸關係從高度對立走上和平協商的轉折點。

20年過去了，汪辜兩老均已仙逝，作為首次汪辜會談的重要親歷者，時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的唐樹備，及時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邱進益，披露了一段塵封多年的「秘辛」，道出當年兩會是如何排除萬難，促成這次歷史性會談的。

■1993年4月29日，「汪辜會談」簽署《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圖為四項協議之一的《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文本。



■1993年4月27日，「汪辜會談」在新加坡海皇大廈舉行，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高層人士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的會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左）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右）在會上握手。資料圖片

唐樹備： 經濟交流協議 拉鋸最長

據中新社25日電：「如何爭取達成兩岸經濟交流的協議，是1993年4月汪辜會談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作為當年會談的重要親歷者，時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常務副會長的唐樹備透露，就兩岸經濟交流，他和時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經過三次預備性磋商，雙方仍無法取得共識。會談期間，他甚至每天只睡三個小時，最終延長一天，才達成兩岸經濟交流的協議。

「根據中央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大陸方面積極倡議舉行汪辜會談，重點就是希望推進兩岸的經濟交流和合作。」唐樹備說。

磋商早期 海基會不提經濟

據唐樹備回憶，1993年4月上旬，時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邱進益應海協會邀請，來北京與他就汪辜會談舉行第一次預備性磋商。當時，海基會對兩會協商的定位是「民間性、事務性、功能性」，重點是「事務性」。海協會則提出應是「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重點是「經濟性」。經過會談，雙方達成的八點共識中，第一點就確定：「雙方均認為，汪辜會談是民間性的、經濟性的、事務性的、功能性的會談。」

海基會秉承台灣當局的意旨，提出要與海協會簽一個單向的保護台商投資的協議。海基會堅持只允許台商對大陸間接投資，不開放台商對大陸的直接投資；在間接投資方面，也拒絕承諾取消在投資項目和金額方面的諸多限制。同時，海基會還拒絕開放大陸企業對台灣投資，也不願取消對進口大陸商品的限制。

鼓勵投資 保護台商在陸權益

唐樹備回憶道，「我當時提出，大陸方面鼓勵台商對大陸的投資，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為此已經頒佈了行政法規，並願意聽取海基會和台商的意見，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對台商投資正當權益的保護，但台灣方面應當開放台商對大陸的直接投資，逐步取消對台商投資大陸在項目、資金額上的限制，並同意開放大陸企業對台灣的投資，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逐步取消對進口大陸商品的限制，同意大陸工商界人士訪問台灣。」

「我和邱進益經過三次預備性磋商，雙方仍無法取得共識。」唐樹備說，儘管如此，雙方在加強兩岸經濟交流的大方向和經濟交流應本着互補互利的原則方面卻有共同點，但在具體文字表述以及與這個議題有關的一些內容表述上，仍有一些分歧。



前海協會常務副會長 唐樹備

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邱進益



■1993年4月23日，唐樹備與邱進益在新加坡為「汪辜會談」進行預備性磋商。資料圖片

延長會議 經濟交流達共識

後來，經汪辜二老同意，決定汪辜會談延長一天，唐樹備和邱進益率領各自的代表團，經過幾個小時的共同努力，雙方各有堅持、互有妥協，最後終於取得了一致。這就是列入《汪辜會談共同協議》中的如下文字：

「雙方均認為應加強兩岸經濟交流，互補互利。雙方同意就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及相關問題、兩岸工商界人士互訪等問題，擇時擇地繼續進行商談。」

「雙方同意就加強能源、資源之開發與交流進行磋商。」「促進科技人員互訪、交換科技研究出版物以及探討科技名詞統一與產品規格標準化問題，共同促進電腦及其它產業科技之交流。」

「儘管上述協議，由於李登輝的破壞，並未在兩會間得到執行，但當時確實鼓舞了廣大台商絡繹不絕地來大陸尋找施展才能的新天地；同時標示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兩岸關係以加強經濟交流和合作為重點的方向，指明了『互補互利』是兩岸經濟合作的基本原則。」唐樹備說，「這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歷史意義。」



■兩岸兩會交流受到民進黨干擾、阻撓。圖為該黨成員在汪辜會談會場外進行「抗議」。資料圖片

邱進益： 排座以右為尊 輪坐主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第一次『汪辜會談』前，我的壓力是很大的。」作為會談的重要見證者，時任台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憶述當年首次赴京為會談作預備性磋商時緊張的氣氛，大陸為此派出40名保安員駐守其下榻酒店，海基會內部會議也得開大水喉防竊聽。而會談取得成功，雙方作出了鮮為人知的努力，包括解決諸多禮節問題，如安排汪辜輪坐主位等。

微有細節安排不適當，就少不了被媒體責難。」

民進黨兩度阻撓 警方控制

然而，會場並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邱進益稱，記得當時雙方在開會前，民進黨後來的主席施明德，帶著十幾人組成的所謂宣達團，到會場鬧事。每個人的T恤上寫着一個字，連在一起是「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他們喊着口號就闖了進來，汪道涵先生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就避開了，最後鬧事者都被當地警方控制了。」

邱進益無奈表示，當時他離開桃園機場往新加坡時，時任桃園縣長的呂秀蓮也找來上百人示威，企圖阻止其出境。「上飛機前我心裡確實有一點悲憤，但怕熱就不要進廚房，背了責任就要盡力完成。」

感激汪老體貼難處

據中新社25日電 光陰荏苒，時過二十載，有兩件事仍令邱進益感念在懷。1993年4月11日，邱進益準備去人民大會堂，第一次跟汪先生見面、辭行。在從貴賓樓出發前，他的副秘書長李慶平接到「陸委會」三個電話，說「對昨天跟海協會草簽的文本有意見，如不照我方意見改正，辜汪會談停止舉行」。「事態很嚴重，我生氣歸生氣，只有執行。到了人民大會堂，入座後汪老還沒講話，我說：『汪老，很抱歉！我出發之前，台北方面有指示，對我們昨天談的還有一點意見，能不能再給我一點時間，讓我跟唐先生再談談？』」汪老聽了不惱不火，笑笑說，既然邱先生有難處，就照邱先生的意見修改。我跟汪先生談了一個小時左右，雙方的副秘書長在旁邊的一個小桌子旁，也把文本重新弄好了。所以，我常說，辜汪會談，汪老是很大的功臣之一。」

「此外，讓我深受感動的，是唐樹備先生合作的態度。當時，台灣兩個收容所裡有2000多名大陸偷渡客，人滿為患，端午節還有人上吊自殺。我提出這個問題盡快解決，唐先生滿口答應，不到三個禮拜，2000多人就接回大陸了。」

邱進益清楚的記得，自己出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是在1993年3月12日，而距離首次「汪辜會談」只剩一個半月。

開內部會議 放水防竊聽

抱著「談不成就回來了」的心態，1993年4月7日，邱進益與時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的唐樹備，在北京先進行「汪辜會談」前的預備性磋商。「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邱進益回憶道，當時北京預備會的氣氛並不輕鬆，他所下榻的北京飯店貴賓樓，單大陸安保人員就多達40人，「我們自己內部的會議的時候，都把水龍頭都開開，生怕大陸竊聽。」

邱進益表示，當時與唐樹備還是確立了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雙贏」，「幸而我與唐先生有相同的外交官背景，很多想法都一致，溝通起來不太困難。」但他直言，即便如此，在例如投保協定等問題上，雙方還是產生了分歧。

汪辜會談前 閒話聊京戲

「第一次『汪辜會談』前，我的壓力是很大的」，邱進益回憶道，作為40多年來，兩岸之間最高層次的談判，當時的島內輿論，又對會談中台灣是否會被「矮化」等問題上，對海基會此行施壓。

4月27日，會談首日，新加坡方面為汪道涵和辜振甫二老準備了休息室，於是邱進益和唐樹備商量是否為二老安排一個會前禮節性會面。「因為，汪先生比辜先生年長兩歲，但會談是汪發的邀請函，所以他是主人，借個客地，理應客人來拜會主人。但又不能是讓辜振甫敲門自報名諱。」最終只能派唐樹備作為代表，先行邀請辜振甫。

見面後，兩位老先生顯得十分相熟，話題從國粹京戲談起竟聊了十幾分鐘。此後，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才正式開始。「包括此後簽署四項協議時，也是雙方互換座位，中國習俗是以右為尊，因此雙方也必須輪坐『主位』。」邱進益稱，這些汪辜會談中的小細節看似不緊要，但事關禮儀觀瞻，「在場有280個記者，我們稍